

时空走廊

100年前，青年毛泽东这样过春节

书评

翼扬

信仰的温度

前几日，朋友推荐一本人民出版社的新书《信仰的底色——红色基因解析》。乍听之下，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近年党史类普及性读物众多，虽不乏精品力作，但板着脸来说话的也不少。不过，朋友径直把书送到我手上，为不负盛意，当晚回家后我便开始翻阅起这本《信仰的底色》。

初初一看，就觉得设计独具匠心，书名与书腰题跋很夺人眼球，仅用几行凝练的文字便可让人一下子触摸到该书所要展示的核心价值——历史的厚度、信仰的温度。读者通过这些充满理性的张力、感性的魅力的文字信息，会很自然地激发起一种阅读的冲动。这晚我就是冲动中不由自主地坐下，就着台灯洒下的温暖光线渐渐进入到书乡之中，思绪随着作者设定的轨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不自觉地被书中呈现出的一个真实历史以及人与事所感动、悸动、触动，以致难以释卷、欲罢不能。仅花了两晚时间我就读完这本《信仰的底色》，掩卷之际竟从内心生发出几分畅然、几许感慨。

客观地讲，书中所讲述的人和事不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该书作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能以独特的视角、新颖的构思，将其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内化于清新凝练、生动鲜活又不失理性和思辨力的文字之中，从而实现了一种历史与现实“化学反应”的聚合，赋予了这些历史故事新的时代内涵。可以说不夸张地说，《信仰的温度》这本书中的不少内容是能给人带来一种精神层面的触动和思想层面的启迪的。在领略作者对党史进行新探索和新认知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所谓“信仰的温度”，实际上就蕴藏于历史的深度中点点滴滴的平凡，要让人真切触摸到她的“温度”，关键是要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使之真实、可信、可感、可鉴，而《信仰的底色》的亮点或成功之处就在于此。

这本书第一编《红色基因》至第三编《党史镜鉴》记述的内容，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党员，所呈现出的形象都鲜有以往部分党史读物中于巴巴的履历、生人勿近的面孔以及标签式的赞誉，而是将他们都还原为有特点、有个性、有情趣、有生活的真实个体，让一个个物与故事有了可感的“温度”。譬如在《朱德的党性》一文，所记述的长征途中朱德面对张国焘制造分裂红军，企图“左”的种种阴谋，坚持党性、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以其独特的方式与之周旋斗争，勇于直面不真真相的指责，敢于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竭力弥合党内分歧，从而达到团结红四方面军跟中共中央“一起走”目标的故事，就真实可信、感人至深，既表现了朱德忠厚朴实的禀赋，更展现了其刚毅果决的党性。而《廖承志的信念》和《革命不是入股分红》两文，则将廖承志和钱瑛这两位有着鲜明个性、秉性刚烈、为人正直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廖承志虽出身豪门，却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曾多次被反动当局投入监狱，也遭遇过党内右倾势力迫害，但却初心不改，始终怀着“莫蹉跎，岁月多”的观，保持“心透神闲头脑自通，坦怀怀着心光明”的革命情怀，并以“百年自有日照料”的信念经受住了革命斗争的考验。而钱瑛这位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和党内“女包公”，新中国建立后虽身居要职，却始终保持着“革命不是入股分红”的清醒，面对党内不正之风敢于拍案而起、亮剑出手，抑或在“文革”中受尽折磨甚至在弥留之际的榻榻上，也以“我朝前看”的坦然坚守着对信仰的选择。再如《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卢绪章的家风》两文，不仅记述了卢绪章为完成周恩来交付的为党筹措学费的嘱托，创办“广大华行”所经历的艰辛与危险，甚或家人亲友的蔑视误解，而始终“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自皮人衣”政治本色，为革命事业做出巨大成绩的真实故事。同时，还记述了卢绪章这位曾掌管中共党组织地下金库钥匙的共产党人，无论在逆境还是顺境，都始终注重清廉家风的养成，他内心充满慈爱，却教育子女追求健全人格，要求他们节俭生活，勤学善思，学好本领，“自己的路自己走”。

在该书中，像《兴兴的坚守》《陈然的气节》《刘伯承入党记》《“江姐”是这样炼的》《何功伟的家国情怀》以及《（红岩）背后的真实历史》等等真实鲜活的故事，都如作者所言是“从浩繁的史料中打捞出”，而此项工作“就像琢玉，把一块玉石的原石，利用各种手法、切割、打磨，慢慢剥离掉杂质，一点一点露出玉石的部分，使最本质、最重要的历史面貌呈现出来”。正因为此，在作者笔下这些共产党人都褪去了以往广为人知的光环，而被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真实不凡，既追求真理、信仰主义，又继承传统，胸怀天下，敢于担起历史责任，为救国家于危亡而勇于牺牲，无私奉献。正是由于作者的用心挖掘，使那些曾经真实存在于历史之中，有志有为、有情有义的共产党人的形象更加鲜活起来，用当今流行的活说就是变得如此的“走心”，他们就好像一盏盏闪着光亮的烛炬，不仅为我党的历史增添了耀眼的光辉，也让这本书有了暖人心灵的“温度”。

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第四编《沉浮侧畔》所集辑的文章，无论是《中国精英界谋求中日和平的一次徒劳尝试》《唐纵与民国官场潜规则》，还是《载进“塔西陀陷阱”的民国要人》《孔祥熙的时代》等等，都撷取于民国时期的真实历史，生动地揭示了当时某些国民党高层，因丧失信仰、追逐名利、营私弄权，以使整个官场潜规则盛行，出现雪崩式腐化的历史过程。这些极有历史深度的文章在带给后人感叹唏嘘之际，也给人留下了更多警醒价值以及反思余地。至少我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不管一个政党创建之初纲领多么先进，党员多么砥砺奋进，甚至事业大功告成，然而对权力诱惑及腐败都是没有天生免疫力，一旦忘了初心、信仰不在，那么距“人亡政息”就不远了。

概而言之，《信仰的底色》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在该书中作者秉承了正确的历史观，在客观、公正、准确地记述历史的同时，带着自己的视角与情感，将关注点放在人物与时代的联系上，注意通过细节来呈现人物在历史大潮中的担当与情怀，如人论事，娓娓道来，无论文字驾驭还是理性解析都做得游刃有余，没有纯学术文章的乏味，读来能给人留下不少思考空间和余味。

我想该书的两位中青年作者，他们想通过这本《信仰的底色》“传递真实的历史感受，提供科学的历史借鉴”的愿望是真诚的。正如他们在“后记”中所言：“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

上”，逐步提出了“集合同志”，组织团体的问题。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成立新民学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要求会员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从1918年创立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民学会活动了3年多时间，前后大约有80多名会员。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团队的巨大作用，他酷爱交友，1915年夏，毛泽东为了联合更多的青年挚友，发出了有名的以“二十八画生”为署名的征友启事，启事说“愿嚶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捐躯的青年。启事寄到长沙各个学校后，还引起了女校校长的误会，以为有人借此到学校谈恋爱，还找上门来质问。

毛泽东对朋友要求很高，用他的话来说，这次征友，只得“三个半人”。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毛泽东画传》一书中，毛泽东回忆说：

“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属于谈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论论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这个范儿。

一群有远大理想、志在匡时济世的有为青年，很快就结为挚友。用句通俗的话来说：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成立了！毛泽东与朋友们关系非常密切，常与好友结伴，四处游学，同吃同住。1918年夏天，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与萧子升、罗学瓚、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抵京后，毛泽东与小伙伴们住在距离北京大学不远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隆然高亢，大被同眠”，生活非常清苦，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给这批青年学子解决了不少难题。也是在杨昌济的引荐下，毛泽东认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李大钊，征得蔡元培同意，被安排在图书馆当助理员，月薪八块银元。

也是在这段时间，毛泽东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从熟悉到相恋。这是他们的青春芳华。

五

中国人习惯春节后出远门，1911年春节后，18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来到长沙。正值中国风云激荡之际。

1921年2月上旬，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做农人工作，一起去革命。《毛泽东年谱》上记载道：“同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谈论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情形。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让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几天后，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毛泽建也在这一年到长沙读书，毛泽覃则于1918年已到长沙读书。

毛泽建1929年牺牲于湖南。毛泽覃1935年牺牲于江西。毛泽民1943年牺牲于新疆。

《毛泽东年谱》上说，毛泽东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但到了1921年，一个佛性少年，已经是一个笃信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了。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与何叔衡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开天辟地的时间到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第四编《沉浮侧畔》所集辑的文章，先生将“萋已绿”释作“萋且绿”，若单以此三字而论，自然并无不通，但联系全首来看，却与诗意相悖。大概余先生自己也觉得有悖全首之意，所以又进一步释道：“这时正是秋风初起，草木未衰，但变化即将到来的时候。”无论怎样解释，总是显得牵强。况且诗中紧接着说“岁暮一何速”，感叹岁暮来得太快，那么“秋草”之“秋”，怎么会是秋风初起之时呢？所以上述几种释读，均难称确切，难以服人。

我们来看傅山是如何理解的。傅山读至此处，顺手批道：“此‘巳’字非从绿字起，却是从‘萋’字来，谓凄然罢其绿矣。”却是着眼于“巳”字。此“巳”不是“已经”之“巳”，而为动词，意思是“止也”“罢矣”。“萋已绿”，是说凄然失去了绿色，而呈陨落肃杀之象。这样解释此三字，无论从字义或为诗意检查，均无可非议。显然，傅山之见，最为确当。读此令人颇多感慨，即想到唐代诗人“片言惊后辈”句。不过，这里“后辈”改作“后世”才对。

如果学界早知三百年前傅山先生有此一语，可省却后世多少并无用处的辛苦论述。

如果今人治学也能像傅山先生一样，学识与创见只用简短文字甚至片言只语道出，该有多好！

“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过江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他的春节，除了游学与读书，锻炼也是少不了的。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进行的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过江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青年毛泽东的锻炼项目很多：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他最爱的还是游泳，一师毗邻湘江，这条江穿长沙城而过，江宽水深，是天然的游泳场。毛泽东时常约二三好友到湘江中流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游泳的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当年一起游泳的小伙伴中，毛泽东和陈绍休泳技最高，但毛泽东仍在不断学习，听说有人游泳好，必去访求。1918年初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李某因事回家，路过长沙，毛泽东知道他是游泳高手，就通过第一师范教师的介绍，邀请他到橘子洲头作游泳表演，并请他详细介绍泳姿和游泳的经验。

毛泽东一生发表了大量文字，有趣的是，他第一篇文章发表的文章，是谈体育的——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刊发《体育之研究》一文，全文约7000字，作者署名为“二十八画生”。这是毛泽东的笔名，“毛泽东”这3个字的繁体总共的笔画数，为28画。

《体育之研究》中运用大量历史、哲学、心理、生理、解剖等知识，对体育本质、原理、方法、价值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研究，全面阐述了“健身救国”的体育思想。他指出，中国饱受列强欺压、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民族体质不强，“国力恭（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国要强，则民必壮，民要壮必须崇尚武风，动员国民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他认为，体育能“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使人“身心并完”。他主张学校教育德、智、体并重，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融汇了八段锦、体操、拳击、气功等各种运动之长，包括手、足、躯干、头部和打击、跳跃等动作，能使全身获得均衡的发展。

在毛泽东看来，体育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磨砺意志。新中国成立后，蔡和森的妹妹蔡畅曾回忆说：一个暴雨雷电大作的夏夜，毛泽东湿淋淋地闯到岳麓山下的蔡和森之家，原来他刚从山上跑下来，就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暴雨弗迷”的境界。

四

从宋代开始，湖南就是烟花鞭炮的重要产地，每逢春节，热闹非凡。

在毛泽东长沙就读的年代，春节照例是烟花漫天璀璨，鞭炮响声不绝，但这些无法掩盖时世之糜烂：国家贫弱，列强虎视，军阀跋扈，官员贪婪，民众穷苦，社会闭塞。毛泽东梦想与志同道合者，共建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从1916年起，毛泽东和朋友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

“游学、读书、交友、思考、锻炼、写作……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这个范儿

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几年后，毛泽东喊出这个口号，谁能比他更有底气？

二

春节，是毛泽东的读书好时光。《毛泽东年谱》中记载了毛泽东春节期间读书的细节：

1915年2月24日，还在春节期间，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写了一张还书便条：“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匿；《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这个便条是他从长沙回韶山过春节时写的。

1916年1月28日，春节已近，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请他帮助借《甲寅》杂志第十一、十二两期。这个月十九日，他再次去信借这两期杂志。

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其一，毛泽东看书是“如饥似渴”型的，其二，对待想读却一时读不到的书刊时，心情也是如饥似渴的。

他对于读什么书，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就在1916年2月29日，他给萧子升开了一个书单，列出77种书目，并注释道：“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

毛泽东堪称“书痴”，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学校课程有限，大加规划课表，半年后毛泽东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从学校退了学，并且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位于长沙定王台的湖南图书馆去看书。

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是这么描述的：“他总是早上开馆就进去，下午闭馆才出来。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塑像一般一动不动。只是中午出去买个烧饼或几个包子当午饭。”

“他饱览了现代西方的历史和地理。为了扩大知识面，他又转涉小说、中国诗词和希腊神话，还有改良派严复新近翻译的亚当·斯密、斯宾塞、穆勒和达尔文的名著以及卢梭和孟德斯鸠的作品，毛泽东在《世界英雄豪杰传》中就熟悉了两位思想家。”

“他凝视着挂在图书馆墙壁上的《世界堪輿图》。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地图：中国只是一个国家，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与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

当时毛泽东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早出晚归，步行3里地到省图书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这半年休学读书生涯，对毛泽东的影响巨大。他后来回忆说，在省图书馆看书，“像牛闯进了菜园子”。

青少年时代养成的良好的阅读习惯，持续了毛泽东的一生。他不是读死书，在读书笔记《讲堂录》中这样写道：“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他强调读书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社会和天下万事万物。要读懂这本书，就必须走出书斋，到社会上去调查研究，即“游学”也。

1916年5月，从长沙到娄底，他的第一次远行，随身就带着不少书，白天有时到外面调查，有时在房里看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就是如此。

三

毛泽东在1958年的《沁园春·长沙》自注中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首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片言惊后世

“如果今人治学也能像傅山先生一样，学识与创见只用简短文字甚至片言只语道出，该有多好

《古诗十九首》在我国古典诗歌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中《东城高且长》一首，三四句为：“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对“秋草萋已绿”的诠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多少年来连篇累牍的学术论文此且不论，名家所著学术专著，有影响者大体有以下几家：

隋树森先生《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引前人注释说：“萋，通作凄。秋草凄已绿，则绿意已凄。其绿不可久矣。”

马茂元先生《古诗十九首探索》（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认为：“萋，通作凄。……萋已

关山远

2018年农历春节马上到了，空气中都是喜气洋洋的味道。大家都在安排春节计划，有的要出境游；有的要宅着，与手机电脑为伴；有的表示要好吃好喝，“每逢佳节胖三斤”……

不妨看看青年毛泽东当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他过得很充实，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游学、读书、交友、思考、锻炼、写作……

一

100年前的1918年，农历戊午年，毛泽东的春节，应该是在长沙度过的。

《毛泽东年谱》上记载说，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出席湖南第一师范校友会职员会议，提出本学学期校友会继续办工人夜校等活动事宜，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天，是大年初九。

这一年，毛泽东25岁，是省城湖南第一师范即将毕业的学生，担任着学校校友会总务（负总责）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对于今天的青年来说，25岁这个年龄，应该是研究生毕业，相当于当今中学生的毛泽东无疑年龄偏大了点。但是，毛泽东却有当今青年无法企及的经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这一年春天，毛泽东“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路上还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问题。”而在春节前的冬天，毛泽东“步行到浏阳县文家市铁炉冲陈赞周同学家探望，晚上与附近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并动手在铁炉冲栽了几棵板栗树。”

文家市是浏阳市南部地处湘赣边界的一个小镇，距离长沙100多公里。陈赞周家境殷实，毛泽东在这里和另一位同学陈昌家住了二十几天，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几乎踏遍了文家市，与当地不少农民交上朋友。文家市此后与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在此完成社会调查9年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会师文家市，擎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面红旗，并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会议，果断否定了继续攻打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走向井冈山，从此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又过了3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一军团来到文家市，巧妙设伏，全歼湖南军阀何键部戴斗垣旅，旅长戴斗垣自杀，敌军上自旅长下至马夫一个也没跑掉，取得了红一军团战史上第一次全歼敌人一个整旅的辉煌战绩，史称“文家市大捷”，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得以显现。

此役发生激战的高升岭，即当年毛泽东农村考察时一步步踩过过的地方。

今天可以推算出的是，毛泽东利用寒假，先是到文家市进行社会调查，返回长沙过了年没多久，又与蔡和森去了洞庭湖一带。

青年毛泽东出了名地酷爱远足，据史料记载，毛泽东的第一次远足应该是1916年5月，他步行数百里，从长沙到娄底茶园山拜访一师同班同学刘且侯。刘家在当地是一个大富户，毛泽东在刘家住了一段时间，在附近进行社会调查。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刘家，毛泽东不住好房间，不睡好床铺，坚持和长工王海文在侧屋睡一个床，屋里放着一个桐油灯，两人抵足而眠，无所不谈，毛泽东因此更全面了解了当地情况。

后人多以“游学”来形容青年毛泽东的徒步远行，他最著名的一次游学，是与朋友萧子升在1917年暑假期间，历时一个多月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特里尔的名著《毛泽东传》中如此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不带一文钱，他们给当地的乡绅写巧妙的对联换取食宿。这次游学历经6个星期，步行近千华里，让毛泽东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1918年春节后与蔡和森游学归来，他志同道合者，在长沙蔡和森家里，成立了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新民学会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

毛泽东一路走来，一路思考。游学经历，对于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帮助，是全方位的。“没

诗话

马斗全

多年来，于学术文字，我尤爱读古人一些笔记和批注，而不喜读现今所谓论文，更不愿读长篇大论。这是因为，古人读书治学之所见，一般只用数十字甚至一二句话就讲清楚了，而今之研究者却一定要撰为论文。似乎只有写成论文，才算得学问。以致有些人并无新见，也要想法写出好几千字乃至逾万字的长文。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统计科研成果，也是以字数计，更是助长这种欺害学术之歪风。

其实，有没有学问，于学术有无贡献，与论文，尤其是与长篇之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古人有片言可以包罗数百言的话。

三十年前，我因搜集整理《傅山全书》，四处寻检傅山手稿和所读书，曾得读傅山批点的《古诗十九首》。令人感慨不已的是，对其中一个问题的理解，已不是数百言片言来讲即可，而是今世许多学者辛辛苦苦的大量研究成果，加在一起竟不如傅山先生的一句简短批注。